**运用考古材料解读早期中华文明史**

卢晓华

（平湖市当湖高级中学，浙江 平湖 314200）

《中学历史教学》2022年第 3期发表

考古学是主要根据古代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及其社会的状况，并进而解析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背景、原因和规律的一门科学。[[1]](#endnote-0)[1]在文献匮乏的史前史研究中，考古材料对于建构历史框架发挥了主要作用。遗物和遗迹作为第一手资源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另外，考古出土的非文字资料往往涉及各种超过了已知文字材料和传世文献的问题——比方说，环境、适应、生存、定居、自然资源的开发、工艺、技术，以及贸易——解放了的考古学将会大幅拓宽历史研究的范围。[[2]](#endnote-1)[2]所以，考古材料引入教学还能拓展学生的视野，特别是在文献与考古材料之间存在冲突的时候，能为探究历史提供新的思考维度。人教版“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一课涉及大量史前史和夏商周早期中国史内容，笔者以“何谓早期中国？”之问为课魂，尝试以考古材料论证，帮助学生理解特定时空下“中国”之内涵。

1. **运用考古材料还原历史场景**

人教版《中外历史纲要》是以“纲要”形式进行历史叙述的，抽去了许多历史现场的丰富信息，简洁抽象，严谨有余而生动不足，故学生难以理解。比如原始人为什么要从事渔猎和采集，过群居生活？学会用火有什么意义？考古材料的引入能帮助学生在头脑中拼凑出一幅相对完整的原始人生活图景，鲜活的画面感有利于激发学习的兴趣。

**材料1：**由龙骨山洞里取出四十多个北京人的遗骨，上十万件的已制成或未制成的劳动工具——石器，成批的骨器、角器，上百种的野兽化石，此外还有用火的遗迹。在灰烬层里，发现了除了鼠的骨骼之外，还有许多烧过的破碎兽骨。北京人头骨的特征是前额低平，眉骨粗大，脑壳很厚，脑子大约现代人平均数的80%，但比猿大得多。北京人的肢骨基本上已具有现代人的形状了。他们的寿命短促，人类学家根据发现的遗骨曾统计，死于约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占39.5%；死于约三十岁以下的占7%；死于四十至五十岁之间的占7.9%；死于五十至六十岁之间的占2.6%；寿命长短不能判定的占43%。

——黄慰文、贾兰坡等：《中国历史的童年（合订本）》

设问：依据考古材料开展合理想象，以“北京人的一天”为主题写一篇历史记述文。

要写好这篇记叙文是不容易的，需要想象力和把考古资料联系起来的建构能力。以下是考古学家贾兰坡对北京人生活的一段描写：

“早晨，秋风送爽，一群北京人由岩洞里走了出来。他们的相貌是怪模怪样的。前额很低，发际向前，眉骨粗大，嘴巴前突，鼻子扁平，像人又有些似猿。他们直立行走，走出洞口，围拢在一堆火的旁边。洞口附近的地面遍地堆积着乱柴和吃剩下的兽骨。一条小河经过他们居住的洞口，孩子们一趟一趟地运送着由河滩上选来的石头；大人们不停手地把石头敲开，制造他们所需的各种工具。在龙骨山东面约二公里的紧靠平原的山坡上，另一群北京人正在采集食物。其中大多数是妇女，也有较大的孩子。大人们经常习惯地弯下腰去捡拾，孩子们一遇到树上有野果，就飞快地爬到树上去摘取。年岁大一些的人，还经常把采集的经验传给孩子们，教给他们辨识各种植物的方法。手中的骨棒或木棒用处真不小，不仅可以用它来挖取块根，还经常用它扒鼠洞，扒出鼠的“冬藏”——干果之类的东西。日落西山，一群一群北京人都先后返回岩洞。一只肿骨鹿被抬上山坡。大家聚拢烧肉吃了。他们很习惯地先把易嚼肥嫩的肉送给老人和小孩，然后自己才肯吃。夜深了，大家都走进洞里睡觉。他们挑选了一块较干燥的地方躺下来，有时还在身下垫些干草或兽皮。”[[3]](#endnote-2)[3]

历史是需要想象的，因为“古代史的材料绝大部分零星片段，如何在片段之间发现和建立“意义之网”，有时靠运气，更多的靠想象。[[4]](#endnote-3)[4]可以说，没有还原就没有历史。根据考古材料，我们不难想象北京人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这不仅由他们所用的十分简陋的劳动工具可以证实，同时由他们寿命的短促也可以说明。因为工具简陋，因此北京人不可能经常获得巨兽。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采集是北京人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人、元谋人这些考古发现，绝大部分不在中原地区。这也是由于生产工具极其简陋，低下的生产力决定了谋求物质资料的方式和聚居地点。那时侯，中原有黄河、洛、伊诸水，河谷地带经常遭到洪水袭击，这里显然不能成为猿人聚居之地。在理解的基础上，教师可深入追问：北京人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唯物史观哪些观点？这样“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将从学生头脑中喷薄而出。理论不是靠灌输而是因为具有巨大的解释力量学生才愿意掌握。

**二．运用考古材料比较阶段特征**

“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哪个先出现？”乍一看，这个问题没难度。看一下教材怎么说就行。但是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培养来看，这需要基于考古证据的历史阶段特征比较。

**材料2：**陶寺遗址有早、中、晚三个城址。早期城址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城垣周长约3600米，总面积为56万平方米。遗址内有宫城、外城，有平民居住区和仓储区，还有祭地的礼制建筑。宫城东南侧是早期王族墓地，发掘王墓6座，使用木棺，每座随葬品均在百件以上。大贵族墓数十座，也使用木棺，随葬品几件至几十件不等。其余近千座小墓大多没有木质葬具和随葬品。陶寺中期王墓是陶寺遗址迄今考古发掘出的最大墓葬，尽管在陶寺晚期遭到捣毁，仍残留随葬品近百件，包括玉器、彩绘陶器、漆器、骨器、20片半扇整猪等。考古人员解读其中的6柄玉石列钺，不仅象征王权和军权，而且与公猪下颌骨共同组成了表达修兵不战的“上政”治国理念。陶寺晚期宫城内遗址还出土了3件写有朱书陶文的扁壶残片，虽然对它具体是什么字，专家解读不同，但这些字符与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之间的明显传承源流关系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陶寺晚期地层单位出土了铜铃、铜齿轮形器、铜环、铜盆口残片和铜蟾蜍片饰。这5件铜器，均系红铜铸造的礼仪用器。

——摘编自李琳之：《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

**材料3：**从考古发现看，在同时期各区系中，陶寺文化的发展水平最高，但它的覆盖面大致未超过临汾盆地的范围；它同周邻文化的关系，则表现为重吸纳而少放射。若同二里头文化比较，可明显看到陶寺文化的局限性，说明陶寺尚未形成像二里头那样的具全国意义的文化中心。

——高炜：《晋西南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

设问：依据考古发掘的成果判断陶寺处于部落还是国家阶段？讨论：陶寺遗址发现所具有的学术价值。

根据发掘的成果来看，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走到了邦国时代的边缘和方国时代。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国”。陶寺遗址对复原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性质、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材料:4：**二里头文化可分为四期。一期遗址总面积超过了100万平方米，是为同时期伊洛平原最大的聚落中心，出土了大量属于特权阶层才能使用的高贵器物，如白陶、象牙、绿松石器、青铜器等。有陶器、骨器和小型青铜器等几种手工业作坊遗迹保存完好。二期遗址总面积超过了300万平方米。遗址东南部发现布局复杂，结构类似于后世帝王宫殿的大型夯土建筑群。宫殿有院落，院内发掘出两组高级而又丰富的随葬品。其中一座出土了一具年龄大约在30-35岁的男子骨架，骨架周围散布着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和子安贝等。骨架上部还摆放着一条大约由2000块绿松石和一些玉料制成的“龙”。遗址内手工业作坊区继续存在，但由夯土墙包围，作为独立区域存在于遗址内宫廷建筑附近。在所有出土的工具中，农具占有42%的比例。二里头文化三期持续着第二期以来的繁荣。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址规模和建筑布局一如既往，但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数量、种类明显增多，质量也有了显著提高。箭镞数量比前几期增加了很多。

——摘编自杜金鹏、许宏：《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究讨会论文集》

**材料5：**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虽然土壤肥沃，但其他资源却相对比较贫乏，譬如，建造宫殿所需要的木材、石料，制作白陶所需要的特殊陶土，制作绿松石所需要的原料，锻制青铜器所需要的铜、锡、铅，甚至普通居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盐等，都要在洛阳盆地之外方圆200平方公里以内才能得到。有的更远，竟需要在500公里以外的长江中游得到。另外，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许多名贵器物，如原始玉器和瓷器等，也是来自于其他地方。

——摘编自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

**材料6：**长江上游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出土的变形兽面纹铜牌饰，一般认为是以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为原型仿制而成。在黄河支流渭河流域的甘肃天水，也采集到了一件兽面纹铜牌饰，与二里头遗址出土铜牌饰相类。

——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设问：根据材料4，归纳二里头遗址反映出的历史信息。与陶寺遗址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有何特点？依据材料4、5提供的线索，推测二里头文化主人获取其他资源和器物可能的途径。二里头文化遗址与周边地区的物质联系说明了什么问题？材料6又说明什么？

二里头是东亚历史上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它的影响分布远远突破了它所处的地理单元。华夏王朝文明的开启就在二里头时代。二里头文化以中原为中心建立，以军事、政治的纽带把已经形成的中华两河流域文化圈进一步联结，迫使各地区进贡其文化精华，并予以消化、提炼，再创造更高层次的文明成果，并以这些成果“赐予”、传播至周围各区，加速了各区文明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削弱了它们的独立性，从而产生了具有双重来源或多源的商代方国文化、周代侯国文化。[[5]](#endnote-4)[5]考古资料对于历史文化发展的长程观察具有优势，通过考古比较，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特征与关联性以及二里头文化对于商周的影响等疑问，学生豁然开朗，印象深刻，学习效果强似机械记忆百倍。

**三．运用考古材料理解历史概念**

历史概念的形成离不开特定的时空背景。考古学在地理和历史之间建立起一种天然的联系，因为每一件来自受到控制的考古发掘中的器物都具有两个背景：一个是历史背景，由此，这件器物可以被放回到特定时期的特有文化传统中去；另一个是地理背景，即这件器物占有一个明确的空间位置。考古发掘使得这两个背景相互结合，从而使得历史事件能够确实地和它们的地理环境联系起来。[[6]](#endnote-5)[6]以西周分封制为例，考古资料的分析能让学生全面把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材料7：**



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王卜于宜口土南。王令虞侯夨曰：迁侯於宜。赐鬯一卣、商瓒一口，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赐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廿，厥宅邑卅又五，……百又四十。赐在宜王人〔十〕又七裏。赐奠七伯，厥〔庐〕〔千〕又五十夫。赐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夨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

注：宜是地名，侯是官名，夨是人名，簋是器名。

设问：宜侯夨簋铭文反映了西周分封制是如何分封的？（提升：从分封依据、对象、授予内容等角度回答）

“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说明周王授土是有“图”作为依据的，这可以让周王对封地内河流、宅邑的具体数目了然于胸。所以周王对宜侯封赐土地的情况，铭文记载十分清楚——“赐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廿，厥宅邑卅又五，……百又四十”。分封时还要“授民”。授民包括担任官职的人，如“王人”和“奠七伯”跟随虞侯迁封至宜。这种人员分配方式，不仅是周王在派遣人员帮助诸侯生存，也是加强中央对诸侯的控制。至于附着在封地上的土著原居民，就是铭文中被赐予夨的“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分封还要“分物”颁给诸侯带有某种象征性含义的器物，如“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带有“文武之道”的象征含义，是受封者拥有合法权力的象征物；还有宗庙祭祀之器，如“商瓒”，表明诸侯与周之间拥有紧密的血缘关系。

**材料8：**从西周诸侯国遗址的发掘情况看，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居民糅合局面。例如，鲁国遗址的陶器风格和葬俗，既有商奄之民的风格，又有周人的风格；琉璃河燕国遗址的文化面貌，包含有周人、商人和当地土著居民三种因素；而晋国遗址出土的情况，反映出周人与当地戎狄土著居民间的密切关系。

——黄爱梅：《西周史》

设问：依据材料西周诸侯国遗址为何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居民糅合局面？结合宜侯夨簋铭文分析“封建诸侯”为何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证周王室对天下的有效统治？

考古资料将学生与西周直接联系起来，赋予了学生对古代一种直接的感官体验，让他们感受到了分封制体现的政治智慧：第一，周代封建是一种统治方式。在天下范围内建立若干以王室懿亲及功臣谋士之国为首的统治区域，瓦解、分割殷人势力，对广袤地区进行有效控制。第二，周代封建是建立在族群大迁移基础上的人口重新编组，促使诸侯国一级的政治组织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第三，周初封建是周人集团内部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形式，保证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7]](#endnote-6)[7]

**四．运用考古材料感悟时代变迁**

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孕育、诞生和初步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如何让学生客观地看待这一时期“最初中国”的历史地位，考古资料最具说服力。

**材料9：**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虽是世界农业发祥地之一，但由于缺少易于开采和冶炼的金属矿藏，这里金属农具的使用远远晚于其他古代文明地区。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在公元前四千纪即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出现了铜刀、铜斧、铜锄等农具。两河流域在公元前四千纪的苏美尔人时代也出现了铜制工具。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在雅利安人入侵之前的公元前三千纪已广泛使用铜制鹤嘴锄。小亚细亚的赫梯人于公元前二千纪发明冶铁术，在耕作中使用铁犁。南欧则很快学会了赫梯人的冶铁术，从而进入了以铁剑、铁斧、铁犁为标志的“英雄时代”。而黄河流域直到夏代（公元前21-16世纪）才出现铜器。铜的冶炼和铜器制造到商（公元前16-11世纪）时始达到一定规模。但直到春秋时期青铜还十分珍贵，被称为“美金”，只用来制造礼器和兵器，很少用来制造农具。所以在殷墟发掘中无金属农具的发现。中国直到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发明冶铁术之后金属农具才被普遍使用。

——马振铎等：《儒家文明》

设问：依据考古材料分析为什么中国上古时代国家产生而氏族制却未解体？

面对严峻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生产工具，中国先民只有依赖群体才能生存。其他古代文明地区的国家，一般是在氏族制度瓦解的基础上，以新的权力机关代替原来的氏族制机关而产生的。例如雅典城邦国家就是在民选机关代替氏族机关、人口重新按地域划分的基础上产生。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却是氏族制强化的结果。如“夏朝社会仍然是聚族而居。除对夏部族生活的地区实行直接统治外，对其他地方主要通过控制一些部族进行间接统治。”“商朝的国家管理实行内外服制。内服指商王直接控制的王畿地区，外服指商王间接控制的方国和部族。”“西周实行分封制与宗法制，史称‘封建亲戚，以蕃屏周’。”[[8]](#endnote-7)[8]考古资料帮助学生深刻理解了教材“从部落到国家”和“商和西周”两个子目的内在逻辑，明白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论观点，深刻把握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变与不变的动因。

**材料10：**中华文明起源如“满天星斗”般遍布华夏大地。当陶寺贵族偏居晋南一隅坐享荣华时，嵩山南麓则是一片“天下万国”场景。随着瓦店、王城岗、古城寨等河南龙山城址相继衰落，新砦大邑崛起并迈开社会整合步伐。经历几百年逐鹿中原，东亚历史上最早广域王权国家在洛阳盆地崛起——二里头，正处在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的节点上。

——桂娟：《二里头：从多元走向一体》，《瞭望》2016年第6期

设问：结合材料10和本课教学所有线索，谈谈你对“何谓早期中国”的理解。

“古国——王国——帝国”是中国考古学工作者用来表示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术语。古国是指原始社会后期出现的单一制初级国家。古国时代，也被称作邦国时代，用最初提出者苏秉琦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满天星斗”，是一种无中心的万邦文化多源时代。古国向前进一步发展是王国。王国的特征是“国上之国”，即各诸侯国或酋邦之上还有一个中央王朝存在。但各诸侯国还有独立的血缘继承权和其他政治权利。王国时代就是从无中心的满天星斗进入到了月明星稀——有中心的多元一体时代。王国再向前发展就进入到了帝国阶段。帝国已经是成熟的国家形态。皇帝可以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9]](#endnote-8)[9]国家发展形态是理解“何谓早期中国”的一条线索。“中国”也是一个地理概念，即中国必须是居于“天下之中”的“中央王国”。“中国”作为词组，最早出现于《何尊铭文》“宅兹中国”。可见，早在3000年前的周人眼中，“中国”即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区，即成周一带。“天下之中”的说法，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宇宙的看法，认为洛阳一带是大地的中心。另一方面，这里确是当时朝会、商业、文化及交通的中心。[[10]](#endnote-9)[10]“中国”还是一个文化概念，即各古国、各诸侯国所共同认定的“华夏”“诸夏”文化共识圈。对陶寺到西周遗址中发掘的大量礼器便说明“中国”这个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敬天祭祖”这个核心内容。实际上，就更为广泛的政治意义而言，文化中国和地理中国也都是政治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11]](#endnote-10)[11]

**五．结语**

史学不是对过去的研究，而是对过去在现在所造成的结果（遗迹、残迹等）的研究，是一种从遗迹到事实的推理艺术。[[12]](#endnote-11)[12]历史教学若想走出死记硬背的困境就应该让学生多接触历史遗迹、残迹，发挥历史想象与推理能力，构建历史图景，而不是把历史结论直接“喂”给学生。在运用考古材料之前应反思：考古材料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什么样的知识呢？在多大程度上，这些知识是真正新的，而不只是重温我们从传统文献上已经获知的内容？如果有的是只有考古学才能提供的知识，那么这些知识是什么？[[13]](#endnote-12)[13]历史课上考古资料的运用显然不是为了追求数量和形式。如果文献资料能有助于解决问题当然不一定要引入考古资料。但文献往往反映的是贵族、官僚和知识精英的事迹和观点，工匠与商人一样，在文献记载中也很少提到。在考古学上我们主要通过其产品以及发掘出来的作坊遗存认识他们。另外，在文献和考古资料取舍问题上，李峰教授的建议值得关注：我们对西周国家的认识基本上可以在西周当代的史料也就是青铜器铭文上建立起来，可以相对较少地受到后代文献史料价值观的困扰。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把西周金文中的情况搞清楚，这样我们即使使用后世文献才会有一个可靠的基础。如果我们从后世文献譬如说《周礼》这本书出发，我们将搞不清这些文献中记载的哪些是西周真正的制度，哪些是后世的创造。……因此，在西周政府的研究中我是不主张用，至少是不首先用《周礼》的。这不是“二重证据法”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有关西周历史的研究真正的立足点究竟在哪里的问题。[[14]](#endnote-13)[14]青铜礼器上的铭文、玉石盟书、简帛文书能提供补充信息，但是这样的信息同样也需要谨慎的释读。比如说，金文和盟书是宗教文书，因而各自带有偏见。但与后世文献相比之下，不会说话的考古材料本身还是具有很强的质朴性。我们只要充分地意识到考古材料和考古学的局限性，考古资料还是可以提供丰富的历史线索的。

1. [1] 王巍总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1页。 [↑](#endnote-ref-0)
2. [2]（美）罗泰：《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3页。 [↑](#endnote-ref-1)
3. [3] 摘编自黄慰文、贾兰坡等：《中国历史的童年（合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6-70页。 [↑](#endnote-ref-2)
4. [4] 邢义田：《立体的历史：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216页。 [↑](#endnote-ref-3)
5. [5] 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第163页。 [↑](#endnote-ref-4)
6. [6] 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4-25页。 [↑](#endnote-ref-5)
7. [7] 黄爱梅：《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3页。 [↑](#endnote-ref-6)
8. [8] 教育部编：《中外历史纲要（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5-6页。 [↑](#endnote-ref-7)
9. [9] 李琳之：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4页。 [↑](#endnote-ref-8)
10. [10] 杨海中：《图说河洛文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endnote-ref-9)
11. [11] 李琳之：《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第14页。 [↑](#endnote-ref-10)
12. [12] （澳）塔克尔：《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史学哲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9页。 [↑](#endnote-ref-11)
13. [13] （美）罗泰：《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第1页。 [↑](#endnote-ref-12)
14. [14] 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官僚制度和国家》，北京：三连书店，2008年，第Ⅳ页。 [↑](#endnote-ref-13)